

从“以文存园”到“纸上造园”

——明清园林的特殊文学形态

文 韬

【摘 要】文章讨论明清士人如何把园林书写作为延续园林物质性存在的手段,继而以文章高下评定园林优劣,最终发展出向壁虚构的“纸上造园”。文学写作不仅克服了贯穿于历代园林诗文的关于园林速朽的焦虑和紧张,还冲击了园林的物质藩篱,颠覆了园林的实体性存在,建构起一个个不拘形式、不畏流转、恒久不灭的精神园林,从而支撑起文字废墟多于实景遗迹、间接情感胜于有形建筑的园林情结。在此过程中,文学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写景和征实功能,进入园林建构的精神层面,在共同呼吸中结构出比物质表现对象更多的“溢余价值”。此类形态特殊的园林书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园林文学”,重新思考文学之于园林的意义,以及文学作为人学的强大建构功能。

【关键词】园林文学;以文存园;园以文著;纸上造园

【作者简介】文韬,女,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理论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雅俗与正变之间的“艺术”范畴: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当中的术语考察》等。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19.4.118~128

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虽然在文化政策上屡次被提及,但在学术层面受到的关注还很有限。过多的文字流于图录式的赏析与评点,或是关于其发展历程和美学特点的概述,此外便多为缺乏温度的营造法式研究。与当前归于建筑学的学科划分相对应的是,人文研究的过浅介入。我们知道,尽管中国山水园林经常被译为“风景园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但它更是文化园林。从自然界选择进来的一木一石都极富人文意蕴,与其他功能性的建筑并不相同。若没有文化和精神的入驻,园林便立刻失去其温度和厚度。如果说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80年代的园林研究,在澳大利亚学者冯仕达(Stanislaus Fung)看来,多少有简单化和整体化的缺憾^①;那么进入21世纪,海外研究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史、美术史视角,则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视野。出版于1999年的 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 难能可贵地汇集了从社会学和跨文

化角度分析意大利园林、德国园林、英国园林、瑞士园林和中国园林的个案,已启先声。只是冯仕达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此,因为他未曾意料到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所以未能清晰地勾勒出园林研究第三期的特点。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法国学者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主编的《城市与园林:园林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2006)、美国学者高居瀚(James Cahill)的《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2012)、美国学者包华石(Martin J. Powers)的《中国园林中的政治几何学》(2015)^②、英国学者柯律格(Graig Clunas)的《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2019)的中译本。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开放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新的研究阶段,传统的文学研究又该如何作为?

尽管园林大家陈从周提出的“研究中国园林,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深”^③,早已成为共识;但是文学之于园林,大多集中

在匾题点景、诗文绘景、诗意造景等方面,仍以泛论和赏析为主,学理方面则以诗文汇集和文学手法的分析较为常见^④,研究手法相对单一,研究水准也有待提高。这样一来,文学仍是文学,并未与园林真正融为一体。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园林文学”?如果把它定义为园林中的文学创作,那么它将与闲适诗一样无所不包;如果界定为与园林有关的文学写作,那么它与田园文学、山水文学就仅仅是描写对象的不同而已。问题是,英国也有杰出的田园诗篇,各民族都不乏对自然山川的礼赞,但中国的园林文学却很难找到异文化的对应,这就绝非仅仅源于建筑类型的特别了。否则我们还可以有祠堂文学,西方也可以有教堂文学。只从题材上进行划分,无疑将抹去园林诗文背后的精神积淀与文化特色。可惜当前的园林文学研究对此虽有所触及,却鲜有深究,处理得相当含糊。

即便“园林文学”的概念还有争议,园林文学的教材和课程却早已落地。固定下来的不仅是文学与园林的关联性,更强调了它写景抒情、游园记事的功能。如果文学之于园林,仅止于相关性,即园林只是作为摹写的客体而存在的,那么园林文学就将是园林外在的、暂时性的、没有生命力的依附。对比更加外在却浸润在人文情怀中的山水文学,我们越发清晰地感到园林文学研究的滞后。那么,怎样从文学进入园林的精神层面,透析叠加在园林物质性存在之上的欲念与理念,从而把握园林的生命力所在?又当如何从园林中发掘文学,在有形的景观与无形的文字之间看到它们的回环往复、共同呼吸呢?让我们从王世贞的弇山园说起。

一、以文存园:文在园就在

大概从隆庆五年(1571)开始,王世贞至少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在家乡太仓建造弇山园,把无可借势的耕地,改造成了十分之四假山、十分之三园池、十分之二房屋、十分之一树木的山水园林。弇山园占地七十多亩,被水体区分为六大区域。东弇、西弇、中弇三座大型假山皆出自叠石名家之手。以“巨丽闻”的弇山园号称“晚明第一名园”,很快成为园林建造

的标杆——张宝臣在《熙园记》里谈论名园时,首先就是“娄水之王”;陈所蕴的《张山人传》以弇山园和上海的豫园为东南名园之首;张凤翼在《乐志园记》里谦称自己的园子“不足以当弇山、愚谷之培塿”;袁宏道称颂东园“殆与王元美小祇园(按:即弇山园)争胜”。足见弇山园的规格之高与声名之盛。

然而,正是由于太过恢宏,王世贞遭遇了来自舆论方面的压力。园林的规格与园主的道德品格,向来关系紧张^⑤。作为朝廷要员和文坛领袖的他,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开脱。他说由于任职在外,造园工程皆由管家主持,自己无暇过问,也鞭长莫及,这才导致营造过度。为了补过,他打开园门,欢迎所有人来参观游览,颇有几分与民同乐的味道。谁承想,慕名而来的游客熙熙攘攘,长年不绝,甚至十天半个月都不肯走。王世贞在自家的园子里还得不停地回避游客,最后只好自己搬走,另寻一处清静地生活(后来的生活被王世贞描述为“戢身一团焦,草衣木食”,与弇山园的富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座耗时十余载,几乎荡尽家财的绝世名园,几成公园,王氏本人一年也不过去个五六趟而已。尽管他声明自己志在修仙,“不贪帝释宫苑”,但无论如何,这恐怕都不是王尚书的初衷。

搬出弇山园之后,王世贞把弇山唱和编成了一本书——《山园杂著》,并附上了园景的木刻画。其中长达八节的《弇山园记》尤其引人瞩目,他详细描绘了园林的各处胜景。即便已经是洋洋洒洒的七千多字(在文言文里已属宏篇),王世贞还是“意犹未尽”,又补上一篇《题弇园八记后》。他补充说,之所以“犹喋喋为此记者”,为的是让子孙后代记住自己的忏悔(“欲令子孙知吾过耳”)。其实,他更在意的是弇山园的后事:

吾兹与子孙约,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速以售豪有力者,庶几善护持,不至损天物性,鞠为茂草耳!且吾一转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饶之不能为主,而吾能不为主似尤胜之。子孙晓文义者,时时展此记足矣,又何必长有兹园也。(赵厚均、杨鉴生编注,刘伟配图《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同

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对于这份产业,他不强求子孙留守。唐朝宰相李德裕就是最好的教训。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处园林,却长期游宦在外,没有时间享用。他写了大量诗文怀念他的平泉别业,还撰文告诫子孙,不得变卖园中的一树一石。如果将来有权贵来豪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⑥。泣涕当然是不管用的,他尸骨未寒,园子里的珍木奇石就被达官贵人们掠夺一空。可怜他那份“唯岸为谷、谷为陵,然已焉”的执著与坚决,最后只是成为后人的笑谈。几乎每篇论及园林难以长久的诗文,都必谈李文饶之愚。与其他人相比,王世贞对李德裕有更多的同情^⑦,毕竟他自己也无法享有园林之乐。但他自认为比李德裕超脱:后人能守就守,守不住就赶紧卖给权贵,尚能使弇山园免于零落凋敝。园林归谁所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保住它的盛容,颇有几分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的慷慨。

王世贞是否真的“去之若敝屣”,还是事已至此只好如此,我们不好判定。但是,如果园子在自己手里都是“转盼”之间似有还无的话,确实也不能指望子孙守住声名远扬的弇山园。当年马燧的奉诚园便因名声在外,其子迫于压力不得不进献给唐德宗,以求自保。事实上,王世贞和李德裕一样,都是“不能为主”者,不过是由于换了一套观念(“能不为主”),从而显得“似尤胜之”而已。这种精神上的优越,不仅源于把关切的重心从长为园主转移到园林常新上来,更在于他为子孙指出了另一种保有园林的方式——“时时展此记”以读园,而不是李德裕“泣而告之”的守园。

所谓的“时时展此记足矣”,指的是以神游代替身游。南朝人宗炳有“卧游”之说,以欣赏山水画卷代替真正的跋山涉水,一时传为美谈。王世贞则认为,品读园记就足以饱览园林之美,而不必真的“长有兹园”:

且夫世谓高岸为谷者,妄夫所云名山者,千万年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一牧竖樵子引之,而能指点以追得其自。若夫园墅不转盼而能易姓,不易世

而能使其遗踪逸迹泯没于荒烟夕照间,亡但绿野、平泉而已,所谓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后之君子苟有谈园墅之胜,使人目营然而若有睹,足跃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辞而已。甚哉!辞之不可已也。(王世贞《古今名园墅编序》,《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383页)

王氏指出,名山长有,而名园不长有。名园的改姓易主本属寻常,园林毁弃的速度也往往惊人。不但绿野堂、平泉山庄这样的达官贵人宅第已是梓泽丘墟,就连上林苑、甘泉宫、昆明湖、太液池这样的皇家苑囿也早已荡然无存。后人未睹其貌,却仍然津津乐道,明知不复存在,依旧心驰神往,不过是因为读了前人描述它们的文字,所谓的“得之辞而已”!所以,辞不可以已,让园墅不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际的最好办法,就是诉之以文,存之于辞。因而王世贞不仅要不厌其烦地为弇山园作记,还要把古今园林诗文都搜集起来,汇为《古今名园墅编》。他还认真比较过山水文章与园林题记的区别:“凡辞之在山水者,多不能胜山水。而在园墅者,多不能胜辞。亡他,人巧易工,而天巧难措也。”^⑧既然山水文章多不如山水本身可观,而园林文字却往往胜过园林实况,那名园不能亲睹,也就不那么遗憾了,能神游于文即可。山水文章可以不看,名园叙录却是一定要欣赏的。与其说《弇山园记》是写给游客的导读,不如说是为自己的自得而作,留给子孙追忆,也供后人神游。游客游园本不需要如此繁琐的讲解,这不过是王世贞个人园林情结的延伸罢了。

王世贞对弇山园后事的交待是情不自禁的,也是万般无奈的。果然,在他去世后不久,弇山园就转售他人了。而且,即便他已经不强作挽留,弇山园依然没有逃脱迅速凋敝的命运。明末的《娄东园林志》提到弇山园时,就感叹已“不复旧胜”了^⑨。王氏子孙如何看待弇山园的易主,是否认为王世贞提供的方法果真有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另一个守不住祖业的后辈,确实认同王世贞的观点。在《文园绿净两园图记》里,汪承镛絮絮叨叨地诉说着自己的曾祖当年如何建造文园,祖父和父亲

又是如何布置绿净园的。那时家底丰厚，“文燕无虚日”。可惜自从父亲过世以后，“家难屡作”。自己身居“薄宦”，既保不住绿净园，又无力整治文园。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当年题咏文园和绿净园的诗和画收集在一起，带在身边，时时观赏。他说：

噫！李赞皇爱其平泉一石一木，举以戒其子孙。未几南迁，而平泉已为他人有。况以余之不才，其能终有此园乎？绿净既属之于外，文园又荒不可治，百余年来，一盛一衰，其可问耶？夫川岳流峙，不敝于穹壤，犹不免陵谷之变迁，区区之园，其不夷为邛阯，鞠为茂草者，几希。亦惟文字丹青，以永其传可耳。予以薄宦，需次历下为寓公者十年余。退食之暇，时展此图，以纾羁旅之思。而又得当时贤士大夫名章俊句以歌咏之，所得岂不多哉？爰述而记之，并乞群贤题咏于右，一以志余不克负荷先业之惧，一以见诸君子惠我之雅焉。（汪承镛《文园绿净两园图记》，鲁晨海编注《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5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汪承镛先用平泉遗恨来安慰自己：园林不终有，宿命已然，即便河流山川，亦是沧海桑田，何况人工营造？对他来说，卧游园图就足以解忧了。而先人留下的园林题咏，具有胜于园林本身的“溢余价值”^⑩。如果自己还能对祖业做点什么的话，他认为就是写篇园记，并请人继续为文园图记进行题咏（注意，是对图文的题咏，而非直接面对园林）。园林迟早是要荒废的，他自知无力让文园恢复往日的盛况，恐怕将来还会一损再损，便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让文园继续繁盛下去——“惟文字丹青，以永其传可耳”。我们看到，园林已经从现实的存在转移到纸上的存续，从传于子孙的简单诉求提升到传之后世的不朽，文学的效力绝非吟风弄月、怡情遣兴，或题咏唱和、匾题纪胜这么简单了。

这一重效应王世贞自然也想到了。在《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里，王世贞写道，堂弟为自己无力护持先父的遗产而愧疚不已。王世贞安慰他说，当年的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平泉、绿野等名园都不为园主所终有，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的名园也被

迅速夷为平地。伯父的园子如今虽已褊小破败，但“幸置之湖海寂寞之乡，厌者不易弃，而欲者不易迹，吾固知兹园之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也就是说，因为不显赫，反而不用担心被他人侵夺，反而能够长久地为王氏所有。谁说王世贞不在意园林的归属？继而，借堂弟之口，王世贞表达了自己更高的诉求：

洛阳之不复园也，盖三百年矣，读李氏《记》，而园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园之不吾长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长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谋所以新吾园者。（王世贞《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124页）

北宋的洛阳名园消失于人世间已三百余年。今日依然历历在目，不过是因为读了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若无文章传世，名园巨墅亦是花落无声。先人的山园又岂止今不如昔？将来恐怕连这现有的一点残存都会灰飞烟灭。既然如此，何必苦苦地把心思都花在修整旧园上呢？还当另谋新途！文章最后讨论出来的“新吾园”之法，就是像后来的汪承镛那样请人写诗作序，最好再配上园图，让后人读到故园诗文就像读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一般常读常新，从而让心爱的园子永远鲜活在世人的记忆里。

这种“新园”之道，在今人看来似乎是望梅止渴，不过是聊胜于无的精神慰藉。但明清士大夫却不这么认为。且不说上文提到的汪承镛如法炮制，就是向来精于赏鉴和营造的文震亨也积极响应：

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以文章著，不若以子孙著也；以子孙之贵显著，不若以子孙之忠孝著也。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如梁、窦、崇、恺，转盼销沉者，不足道已。即所谓平泉、绿野，奇章之石，履道之竹，始未尝不挟其高名，护及草木，而及身以后，渐辱于樵夫牧竖之手，荒烟断址，遗丘故馆，不可仿佛。始不得不托于辋川之唱和，洛阳之记述，谓即代纪辽远，水浅尘飞，而文章之流于天地间者，千古如新。（文震亨《王文恪公怡老园记》，陈从周、蒋启霆编《园综》，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文氏开篇即言，以富丽传园，不如以文章传园；以文章传园，不如以子孙传园；以显贵子孙传园，不如以

忠孝子孙传园。其实,这三层关系应该倒过来看:因为怡老园“历八朝、六世、二百年,而始终为王氏物”,难能可贵,所以文震亨要突出园林以子孙著;虽然王文恪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王氏的后人却并不显赫,因而应后辈之请而作文的文震亨只能在“怡老”上大做文章,突出王氏儿孙皆忠孝辈——忠在为官正直,孝在继承先祖的精神和保持园林旧貌上。事实上,“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才是立意的中心。文震亨说得很清楚,铜池、金谷、丝障、钱埭、平泉、绿野都只剩下“高名”了,“不足道已”。可以称道的辋川别业和洛阳名园,都是因为有了诗文的流传,所以园林还有赖文字来保持“千古如新”。而这正是他作记的意义所在。末了,他果然回到“其忠孝子孙著者,更以文章著”上来——仅仅子孙忠孝还是不够的,非得有文章存世。若无文章,“代纪辽远,水浅尘飞”,子孙之忠孝又于何处征表?园林之金碧又从何想见?

二、园以文著:斗园不如斗文

《王文恪公怡老园记》最后的“夫余不能以文章著兹园也,或即借兹园以著余文章乎?余乃有厚幸矣”,颇堪玩味。文震亨说自己的园记未必能提升园林的知名度,但怡老园或许能反过来帮自己扩大文名,因而他非常乐意写这篇文章。这当然是文人间的客套。大家都很清楚,之所以总是找名人来题写园记,为的是借文名以提升园名。如果没有王勃的《滕王阁序》,滕王阁哪来这天下的盛名?柳宗元说得好:“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⑩若无王羲之的妙笔,兰亭的清流翠竹不过是寂寂春山,不可能如此享誉千古。所以,当文震亨谦称“借兹园以著余文章”的时候,他和王世贞一样,心底里还是认为自己能够“以文章著兹园”的。

事实上,王氏的怡老园名声不大。早在文震亨为它作序的时候,县志就已经把它和西园混为一谈了,以致文氏还得为此辨析一番。而怡老园之所以能够引起笔者的注意,乃是因为《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曾经为它作序。可见,文章确实可以成就园林,

找对人很重要。比文氏稍晚一些的胡恒就曾感慨说:“予尝惜子长上会稽,太白南寻禹穴,皆无游记。然名山者,千万年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若无亭台桥榭,与时废兴,易代而后,能使其遗踪逸迹,犹想见于空翠湿红间,必托于慧业,若康乐、子厚者以传。”^⑪要想让园林的“空翠湿红”千百年后犹在目前,还需谢灵运、柳宗元这样的大家来执笔,否则园林的寂灭快于名山大川,留下的遗憾就远胜于司马迁、李太白未作会稽文章了。胡恒很会说话,他所说的“慧业”所托者不是自己,自己只是为祁彪佳的《越中园亭记》一书作序而已。能状园林春色,补谢、柳遗恨的,乃是请托人祁彪佳。明清时期,肯在园林建造上下功夫,并颇有遍题园林之志的,除了王世贞,便属祁彪佳了。他著有遍记绍兴城二百八十多处园林的《越中园亭记》,还有题咏自家园林的《寓山志》,其丰富细致程度不亚于王世贞的《古今名园墅编》及《山园杂著》。

祁彪佳本人倒也不敢自比谢灵运和柳宗元,在文章写作方面,他不如王世贞自信。王世贞在《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里,曾借堂弟之口说:“夫园之不吾长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长在天地,吾亦知之。”王世望认定王世贞的文章可以流传千古,所以要借王世贞之手来给园林保鲜。而王世贞也认为自己的文章能够存园林于不朽,所以当仁不让,并忍不住表露了心迹。如果说给别人写一篇园记,尚有追慕辋川唱和之心,那么,给弇山园写的那一大堆文章,就难免有更高的期许了。他对自己的儿孙、自己的园子不那么自信,对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名却是相当自信,这也正是他敢说子孙读懂自己的诗文便不亚于拥有弇山园的底气。

可惜的是,王世贞尽管当时能够领衔文坛,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亦不过沧海一粟。在今天的文学史里,作为明朝复古派“后七子”代表人物的他,得到的评价并不那么高,关注他的人也不那么多,乃至不少人把他和清代声名更大的王士禛混为一谈。王世贞为时人所艳慕、为后人所向往的,恐怕还有他的弇山园。祁彪佳为后人所熟知,也和他的寓山园密不可

分,即便读过《弇山园记》和《寓山注》的人并不多。才艺如文震亨,虽然参与过苏州香草垞、碧浪园、药圃和南京水嬉堂的建造,但名望远不能和他的曾祖文徵明相比。他没有被后人遗忘,还是因为时有园林雅趣的《长物志》在流传,《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从这个意义上讲,园林真是提升了他们本不那么显赫的文名。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弇山园早已毁弃,我们对它的神往,并仍视之为“晚明第一名园”,的确确实是因为有王世贞及其他人的大量诗文存世。从文学价值上看,《弇山园记》谈不上佳制,却因其繁复细致,使我们还能想见其巨丽,甚至能据以还原它的旧貌。祁彪佳的寓山园,包括王氏的怡老园、汪氏的文园和绿净园,也早已砖瓦无存,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也是因为有关文章在。如果说弇山园、寓山园名声较大,关于它们的记载较多,那么怡老园、文园、绿净园就不算特出了,完全是凭文章保存了下来。如此看来,汪承镛虽然无力恢复现实中祖业的荣光,却果真增益了文园和绿净园的永世价值。文震亨之于怡老园,也确实做到了“以文章著兹园”。那么,王世贞的喋喋不休就绝非无谓之举,他保有园林的方式也并非迂阔了。

既然园以文著,评定园林就可以不仅凭财力,也可以倚重才情了。展示主人殊才别志的居处玩好,尚需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审美基础,而文章写作所费无多,亦不辞闭门造车,便显得轻巧许多。园主们乐于招待文人骚客,除了酬答唱和的雅好之外,更是为了留下墨宝,增益园名。不少人甚至不远万里,带着园图,乞人作序。受托者根本没去园子看过,照样洋洋洒洒,娓娓道来。钱谦益《聊且园记》和王源《涛园记》便是如此,正所谓“观图何必见园”^⑤。这也是明代以降,园林题记面目趋同,文学价值下滑的一大原因。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便公然以纸面文章评定现实园林的高下:

古称名园,南则辟疆,北则金谷、平泉。辟疆故不以文名,石季伦文矣,而不为记,李文饶最号有文,

为《平泉庄记》矣,而园之胜往往出其文上。……余谓玉叔此记是生平第一文字,遂令二酉为天下第一名园。然从楚人谈兹园,从今人读今文,犹谓余之言无当也。须千百年后,陵谷迁夷,而此文岿然独垂,吊古之士津津兹园,远驾辟疆三君,近齐弇州老子,而余与玉叔恨不得从旁一抚掌而窃听之耳。(王世懋《二酉园记序》,《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351页)

王世懋以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东晋顾辟疆的辟疆园、唐代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为古代名园之冠。只可惜顾辟疆没有文名,言外之意是主人还不够风雅。石崇虽撰有《金谷诗序》,却未曾专门为金谷园写过园记。李德裕倒是写有《平泉山居草木记》,却文采不够,辞不胜景。对古人苛求了半天,为的是给后面的二酉园主人陈文烛做铺垫。二酉园自然是无法和金谷园、辟疆园、平泉山庄比富丽的,但主人能够自撰《二酉园记》,且“笔端能使培崦不移而峙,草木不根而植”,加上好作神仙家语,读其文令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使人褰裳欲往也”。斗园变成了斗主人,而主人的高低取决于所作文章的优劣。如此一来,陈文烛便轻而易举地胜出了。其实,石崇、顾辟疆、李德裕都不是以文章名世的人,这样的比对未免避重就轻。

更有意思的是,王世懋认为陈文烛的园记写得比李德裕好,由此判定二酉园压倒了平泉山庄,跃居天下第一名园。此间不仅越过了金谷、平泉之外的历代名园,也越过了《平泉山居草木记》之外的园林文章,可谓是煞费苦心地为文造辞!问题是,王世懋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还颇有信心,声称当地人和当时人都不足以否定他的判断,非得等到园林无存的后世,人们才会承认二酉园近可与王世贞的弇山园媲美,远则胜金谷、辟疆、平泉。也就是说,亲眼见过二酉园的人的意见反不足为虑,仅凭文章臆想的人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反过来说明二酉园并不盛大,也不特出,普通人未必会给太高的评价。但是,既然园林迟早是要废弃的,后人反正也看不到它的真面目,纸上的园林风采就必定是最后的评判依

据。既然金谷、辟疆已于文无征,平泉文章亦干瘪无力,那么在园林文章上下足功夫,就是超越古今名园的终南捷径。对于戮力为文的明清士人来说,这平易了许多,毕竟极少有人能有顾辟疆、石崇、李德裕那样的财力和权力。当然,前提是自己能写园也能造园,避开那些长于为文却没有园子的文章大家。陶渊明、杜甫笔下的草堂不算园林,所以今人里头最躲不过的,就是他的兄长王世贞。王世懋在吹捧二酉园的同时,也不忘肯定弇山园的不可逾越,尽管二者的规格可能相差甚远。

《二酉园记序》最大的逻辑断裂还在于,它仅仅是拈出不以文胜的金谷园、辟疆园和平泉山庄,对于文士们津津乐道的王维辋川山居、白居易履道园、司马光独乐园等却不置一词。显然,在这些反例面前,哪怕是园林规格略低,园主的文名也是压倒陈文烛和王世贞的。这一处回避,正是作者的心虚之处,也是他追慕的方向。

三、纸上造园:有文即有园

自家的园子不怕小,小反而有种道德的优胜,就像徐学谟笔下的鹤适园那样^⑤;不怕简,简亦可以文取胜,如同陈文烛的二酉园一般。怕就怕自己艳慕已久,却压根没有那一亩三分地。王世贞让子孙们时时展卷读文,读的还是自家园林的辉光。文震亨说“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著的也是品评优游的乐趣。但对于那些无力造园的普通人乃至贫寒士子而言,既无力享有园林之乐,恐怕也就没有题写园记的心情了。然而,人之常情到了明清士人这里,却未必如此。无园无地者,照样可以得意忘形地品园、序园,这便意趣独到了。例如,清人钱泳看得朋友整日忙于园林建造,径直议论说,其实园子根本就不必自己造,跑到人家园子里尽情赏玩一通,不更省钱省心吗?断断于自有其园,将来倘有不测,一切予人,终归还是无法独享的^⑥。他非但不以无园为恨,还在遍游群园之后,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履园丛话》,评论诸园短长。可谓是一无所有,却处处著我,亦自有一段风流。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明人王时敏建造乐郊园的时候,“不惟大减

资产,心力亦为殫瘁”。后来非但没能住上几天,园子还很快就荒芜了。最后不得不一分为四,分给儿子们。抚今追昔,他想起徐勉《为书诫子崧》里的“古往今来,名园甲第,皆同逆旅,每怪时人谓是我宅”^⑦,悔恨不已。

当然,钱泳长期游幕,足迹遍南北,才会有博览群园的机会。清人张师绎虽然也认同乐趣不唯自营^⑧,却苦于郡无名园,又无力饱览豪富者的私园。他的出路是,学别人的样子自造一园,不过却是造在纸上而非地上,取名为“学园”。所谓“学”者,“必有事焉之辞,非已于事之辞也”,即想做却不一定能做到。张师绎明言“愈学则愈未能,愈未能则愈知学”,知道自己越是学得像、写得真,园子就越是造不成;而越是实现不了,就越发念念不忘。但是,既然“吾观文人之记园者夥矣,多文过其质,实不中其声”,那么自己再“文过”一点,以无为有,也就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这一学,学得有模有样。若非作者自己最后点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笔下的楼台亭阁都只是纸上蓝图,压根就没指望过实现它。好比高凤翰写“人境园”,通篇详述园中胜景,无一处虚笔。若不细审文题《人境园腹稿记》,我们肯定想不到通篇都是臆想,只是“腹稿”而已!

如果说张师绎“名实之不相应,而无与有之相蒙无已时”的感叹,多少透露了些许心虚。那么明人刘士龙在建造“乌有园”时,就理直气壮、兴高采烈多了。他开篇即言,自己的乌有园乃一无所有之意,接着说:

(金谷、平泉、洛阳名园)造于今求颓垣断瓦之仿佛而不可得,归于乌有矣。所据以传者,纸上园耳。即今余有园如彼,千百世而后,亦归于乌有矣。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有,何必纸上者非吾园也。景生情中,象悬笔底。不伤财,不劳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于食贫者矣。况实创则张没有限,虚构则结构无穷,此吾之园所以胜也。(刘士龙《乌有园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387页)

既然名园终归乌有,后人仅得之于纸上,那么只要纸

上风光独好,便足具园林之乐。园子本身如何、是否存在,对于展卷人来说并不重要。何况纸上造园可以想象无穷,只会比真实的园子更可观。既不劳民,又不伤财,无经济之负累,无道德之指摘,岂不更好?尤其适合那些无力造园的贫寒士子。于是,刘士龙手舞足蹈地大谈特谈园中之山水、园中之树木、园中之花卉、园中之缔造。末了,还不忘补上真园所无法比拟的长久性:“吾之园不以形而以意,风雨所不能剥,水火所不能坏,即败类子孙,不能以一草一木与人也。……又吾之常有吾园,而并与人共有吾园也。”在文字的世界里,确实可以择取生活的美好;在虚构的天地中,的确能够规避现实的浇漓。“乌有”可以是一无所有,也可以是无所不有!勘破了有与无的界限,也就颠覆了人生的幻与真。与其说纸上园林不畏风雨,不如说精神的园林可以永世长存。此节一经道破,自然点醒世人。这不,黄周星便用了三倍于《乌有园记》的文字,细致入微地营建他的“将就园”。

将就园位于将山和就山之间,两园一以山胜一以水胜,一以疏胜一以密胜,一风雅一古穆,一宜夏一宜冬,以将就桥相连,包揽各种美妙。有意思的是,此山无路可通,唯一的入口在山腰的瀑布后,需“冲瀑出入”,简直是《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的翻版。山奇崛,山内还无虎狼、无蚊虫;村咸宁,村民还无欺诈、无争斗,俨然一世外桃源。在将园的花神祠里,黄氏让历代才子和美人配享花神。在就园的祠阁里,又以历代节义之士配享关帝,以历代高士逸民陪侍吕洞宾。与其说这是悬想的园居生活,不如说是在挥洒文人意趣。不惮玄远,不避细碎,为的是让园子“亦在世间,亦在世外,亦非世间,亦非世外”,这就是纸上园林的妙处!“将者,言意之所至,若将有之也;就者,言随遇而安,可就则就也”,“将就主人”骋墨其间,洋洋自得,浑不知人间寒暑。开篇言“自古园以人传,人亦以园传。今天下之有园者多矣,岂黄九烟而可以无园乎哉”,终篇曰“于是主人复岸然对客曰:‘谁谓九烟无园者?若此区区者,谓非九烟之

园乎哉。’客乃唯唯而退,于是九烟曰‘有园’,天下万世之人亦莫不曰‘黄九烟有园’”,真是盛气十足!“天下万世之人亦莫不曰‘黄九烟有园’”,更是发出了纸上造园的最强音:有园在纸,有心若此,便可傲视天下,万世不灭!

将就园纯属虚构,确以文传。刘士龙生平不可考,全赖《乌有园记》留名,真真是人亦以园传。园也好,人也罢,确实是通过园记得以传世,凭的都是纸面文章。本来,“富润屋,德润身”,大兴土木是富贵者之事。常人力所不逮,也就不存奢念了。而这批文人,明知力所不及,又不肯死心,便煞有介事地在纸上“弄虚作假”。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批向壁虚构的园林题记呢?

钱泳在《履园丛话》里提到:“吴石林癖好园亭,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无是园记》,有《桃花源记》《小园赋》风格。”江片石曾就此题诗两首^⑧。第一首说“万想何难幻作真,区区丘壑岂堪论。那知心亦为形役,怜尔饥躯画饼人”,认为在贫寒的境地里,以幻为真未为难事,即便笔笔丘壑,亦是画饼充饥,终究无法放下对园林的世俗渴望,终究是为外物所累的可怜人。因此,第二首“写尽苍茫半壁天,烟云几叠上蛮笺。子孙翻得长相守,卖向人间不值钱”就绝非肯定纸上园林不易易主的优长,而是即便写尽苍茫、呕心沥血,也终归是“不值钱”的废纸一张。虽表同情,虽甚悲怜,终归一片凄苦与苍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把纸上造园视为寒士的自我慰藉。就像明人卢象昇,自知园林难成,无奈“平生无他嗜好,林泉图史之癖,苦不可医”,便用纸笔自造了涓隐园,并安慰自己说:“兰亭梓泽,转瞬丘墟,何物不等空花,岂必长堪把玩?向者邯郸卢生一枕睡熟,毕四十年贵贱苦乐,此吾家故事。吾园又何必不作如是观?”^⑨梦里的繁华也是繁华,世间的恩宠不过空花,对纸神游的舒畅怎么就不是舒畅了呢?心情一样,至于起兴之物是景还是文,何必深究?如果这样一种精神慰藉,确实能让人达观与释然,我们又怎能轻易否定?如果贫贱如吴石林者,也能在无是园

里获得和王世贞子孙读《弇山园记》一样的快乐与满足,我们又怎能小觑其精神的富足?文学也好,建造艺术也罢,都可以是一种释放、一种升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乃至整个大观园里的故事,又何尝不是曹雪芹的一个白日梦?

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放宽视域,着眼于文学的本质,就不难发现,园林题咏至此,已经不再是“恐来者之无所征”^⑧的备忘了,也不再止于个人闲适和情志的抒发,而是在延续有限的物质世界(“以文存园”)之后,进入到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上来了。园林文学脱离了物质的园林而独立存在,平移到想象的世界中来。与其说园记不再征实,不如说借助于文学,园林在精神层面上展开了建设。此间的一砖一瓦,不仅与园林图绘拉开距离,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学意味,更凸显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向度。这是尘世间的灵魂工程,就像白居易庐山上的那间草屋,虽大半在山光,却依然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心的居所。更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虽明知其幻,却依旧是嚷嚷尘世最静心的家园。还是王思任说得好,世俗所谓的“园”不过是“随其心之所及,买天缝地,挹水邀山,相之以动潜,旺之以馆榭,主人以为己有,狂士矍矍于柳樊之外”的死物。而事实上,“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则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摩诘之辋川甘景,杜少陵之空庭独树也,皆园也。不得者,且为荡丘,为聚血,为哄市,为棘圃,为斜阳荒草、狐噪蛇啸之区,乌乎园”。只要意在,无处非园,园林并无一定的规制和程式。因此,真正的能为园者不必“规规瓦埴中”。就像作者的朋友刘迅侯,虽然平日所居仅“一丈之室”,但袖中有沧海,笔下无尘气,“于是乎名园不但为主人有,而尽为迅侯有”。王思任自己造不起园子,却扬言要像刘迅侯一样,做天地间真正的万园之主:

余力不能园,而园之意已备,上自云烟,下及圉溷,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泼墨耳。五楹水阁,青亦不了,残夜月明,天际甚远,迅侯咏不之及,

何耶?是犹规规瓦埴中也。(王思任《名园咏序》,《园综》,第438页)

口中有句便处处有韵,胸中有园便无处非园。得园不在于实有,而在于意到。甚至未曾发之于文的成竹在胸,也胜过吟风诵月的依凭物象。这是一种新型的占有方式。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研究明代物质文化时指出,由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传统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受到来自巨商富贾的冲击,因此他们转而强调对美学奢侈品的实际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占有它们的方式。这场涵盖审美和收藏的雅俗之辩,不过是文化精英为维持其权威地位而发明的新型趣味^⑨。柯律格的意见确有相当的合理性。官至刑部、工部主事,后来做到礼部尚书的王思任(另两位纸上造园的黄周星、卢象昇也官至户部主事),都没有足够的财力兴园造林,何况张师绎这样的小知县。然而,他们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出身,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资财或许不足,文才却是优胜的,这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我们也要看到,纸上造园者还有吴石林这样的“奇贫”之士,未必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至少是沦落下层者,照样可以在精神的园林里寻求满足。因此,我们不必把纸上造园通通视为被动的文化阴谋,亦不必视为受困于经济的文化出口。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士大夫而言,园林寄寓着林泉,象征着与名利场相对立的恬淡与自在,是一种正向的政治文化生态,具有不容否定的精神引领作用^⑩。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城市园林是理想的生活家园,指向柴米油盐之上的富足、娴雅与从容。通过文字的指引与思想的沉积,透过园林的花窗与柳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建筑、超越困苦,乃至超越凡尘的人间情怀。如果没有这种情怀,园林便只是木石与房屋的艺术结合,无法汇聚如此众多的文学书写,园林诗文也不会呈现如此近似却分明的思想内涵。当然,这种情怀并非成型于一园一文,而是在不断的书写与传递中,慢慢积淀并蹈扬出来的。这种源于园林,又高于园林,最终推动了园林书写的园林情怀,便是园林的“溢余价

值”——高于园林自身，乃至多过园林题写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因为它不仅催生了新的园林建造——或有形或无形，更催生了新的园林文化传统——从造境到解读，从营建到题写，从记胜到承继，皆在思想的层面有迹可循，在情感的向度殊途同归。

从以文存园(有了文章，园林没了也能继续鲜活)，到园以文著(园林的高下由文章来评定)，最终发展为纸上造园(没有园子也能用文字来造)。通过文学，速朽的园林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和残存的、有限的存世园林一起，不断激发新的园林建造(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而超越了实体的精神园林一旦成型，园林记忆便成为园林情怀的载体，由最初的即景生情、据实摹写，变为依情造境、纸上造园。园林书写脱离切身的体验，成为悬想的虚构，园林就不再是实体的空间，而是情感所聚的文化空间、精神空间。就像古代文人未必都去过南方，却人人笔下都有一个诗意盎然的江南。考虑到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园林书写，我们就不得不把园林文学理解为由园林情怀所激发的文学写作。即不再是园林中的文学创作，因为还有一部分是身在草庐的悬想；也不再是有关园林的书写，因为园林不是外在的、工具性的题材选择，催生写作意愿的也不是园林本身，而是园林背后的情结。这种情结许多时候还不是来自真实的园林建筑，而是来自文字营建的精神园林，这与“青山依旧在”的山水文学是大不一样的。

笔耕纸上的园林书写，何尝给园林添过一砖一瓦？又何尝不是在纸上造园呢？文人把物质园林一笔一笔地引渡到精神的世界里来，在精神的园林里左顾右盼，开出通往永恒的千门万户。园林的可居可游本不该是权贵的专利，把园林建在纸上、建在心里本身就是对物欲的超越。就像吴应箕所言，“予偶念至而园成，园成而复念园可不必有也”^③，心至则园成，文成也就不必真造园了。因为已有自己的精神园林，那才是亘古如斯的灵魂栖息地。否则，家园情怀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就会在求田问舍的攀升中越走越远，好比今日愈演愈烈的“炒房热”。田园无法

占有，山水不可独享，园林却是一己的世界。源于人类的物欲和占有欲，却最终超越了对物质的攫取，成为身心的归依。与其说园林是住人的，不如说园林是驻情的，是放心的。园林的文学性存在打破了园林的物质藩篱，乃至冲垮了“园林”的概念本身^④。正是在物质的消解中，我们看到了精神的特出，看到了文学强大的建构功能。文学，是诗意的栖居。园林文学，真正的诗意不在于红英翠柳，而在于让人能够在可丰可俭、可大可小乃至可有可无的“太虚幻境”里诗意地徜徉。如此，园林文学才会是关乎园林，更关乎文学的精神建构。园林文学才是不容置疑且意义非凡的特殊文类。

园林书写层层叠加，越垒越厚。这种书写越是丰厚，实体的园林就越是淡出。渐渐地，书写废墟的文字比废墟本身更具导向性，也更富生命力。王世贞便指出，园林可以不游，园记却不可不看。如此，园林遗址就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建筑废墟，它成为怀古的对象和激发园林写作的契机。而记录这些“废墟”的文字，则成为意义鲜活的载体和新的生长点，不断催生出新的园林建造。在这个新旧杂糅、虚实不分的传统里，对园林的向往更多的是源自对园林的想象，而对园林的想象往往来自园林文学。触手可及与身在其中已不再是园林之乐的必要条件，毕竟在中国古代，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现代中国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建造家园，对园林的钟爱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看了几眼苏州园林。少数人的占有最终发展为多数中国人的情结，积淀为远远超越于楼台亭阁、砖瓦草木之上的文化风景。这样的文学，难道还是可有可无的附丽？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么？

注释：

^①参见 Stanislaus Fung 对 20 世纪中国园林研究所做的概括，他把七十年来的园林史研究(到他著文的 1999 年为止)分为三期——3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并论及各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和主要问题。Stanislaus Fung, *Longing and Belonging in*

Chinese Garden History, Michel Conan eds, 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 Washington: Dumbarton and Collect, 1999. 另可参见李泽、张天洁《文化景观:浅析中国古典园林史之现代书写》,《建筑学报》2010年第6期;周向频、陈喆华《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4期。

②吴欣编《山水之境: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4—130页。

③陈从周《园韵》,《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④参见林秀珍《北宋园林诗之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徐志华《唐代园林诗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参见[美]杨晓山著,文韬译《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25页。

⑥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孙记》,赵雪倩编注,刘伟配图《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1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

⑦王世贞只是说:“李文饶达士也,为相位所愚,至远遭朱崖,身既不能长有平泉之胜,而谆谆焉戒其子孙,以毋轻鬻人。且云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治命,泣而告之。呜呼!是又为平泉愚也。”(王世贞《题翫园八记后》,《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121页)白居易《杏为梁》则说:“更有愚夫念身后,心虽甚长计非久。穷奢极丽越规模,付子传孙令保守。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册,第243页)

⑧《古今名园墅编序》,《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383页。

⑨关于弇山园后事的追踪,参见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⑩“溢余价值”源自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机智与私人生活》([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9页),指中唐诗歌通过机智的诠释,诗意地赋予事物远高于自身存在的价值。笔者借用此概念,指通过文学创作及其传承和积淀,最终使表现对象获得高于自身客观存在的多余价值。一如园林文学不再是园林诗文作品的汇总,还发展出深厚丰富的园林情结及其文化传统。下文将进一步展开。

⑪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七《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729页。

⑫胡恒《越中园亭记序》,《园综》,第389页。

⑬李调元《醒园图记》,《园综》,第475页。

⑭关于对《鹤适园记》的解读,参见拙文《何谓闲情:园林审美及其书写中的“放情”与“防情”》,《同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⑮原文为:“园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园亭,有一花一石者,吾来啸歌其中,即吾之园亭矣,不亦便哉?”“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顾眼前,倘有不测,一切功名富贵、狗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况园亭耶?又安知不与他人同乐也。”(《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5辑,第217页)

⑯王时敏《乐郊园分业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5辑,第238页。

⑰张师绎引范仲淹语曰:“东都多名园,自司马公、富公而下,无一不可行游。某即治园,何以加兹,某即不治园,而享有园居之乐。人得兼数十园而时有之。”(张师绎《学园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156页)

⑱参见钱泳《履园丛话·造园》,《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5辑,第217页。

⑲卢象昇《忠肃集》卷二《涓隐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244册,第6页。从中亦可见卢象昇并不打算真的建造园子,题记中的“园未构而记先之,明吾志也”只是托词而已。

⑳陈璘《安澜园记》:“过此以往,年弥远而迹日就湮,余恐来者之无所征也,故记之。”(《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5辑,第322页)

㉑参见[英]柯律格著,高昕丹、陈恒译《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5—149页。

㉒参见拙文《无竹何以令人俗:古典园林竹文化意蕴新探》,《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

㉓吴应箕《暂园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309页。

㉔“园”从口,《说文解字》释为“所以树果也”。段玉裁引用《郑风》毛传“园,所以树木也”,认为木可以包果,当理解为“所以树木也”(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形象地说,就是围一片地来种树,物质性边界的围墙是园(而非苑)的基本特点。